



人間書

高增德\著

鴻儒遍天涯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• 人间书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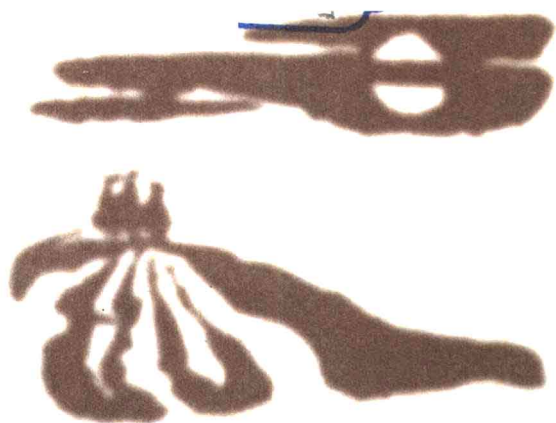
鸿儒遍天涯

高增德

著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17-21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鸿儒遍天涯/高增德著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1997.8

(人间书)

ISBN 7-216-02137-1

I. 鸿…

II. 高…

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· 人间书 ·

鸿儒遍天涯

高增德 著

出版: 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邮编: 430022

印刷: 文字六〇三厂

经销: 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 12.25

字数: 278 千字

插页: 5

版次: 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8 140

定价: 14.70 元

书号: ISBN 7-216-02137-1/I·220

自序

作为我个人的文集，应该说这是第三本了。然而前两个集子，编就后适逢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，因我被株连为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的“三家村”分店及黑帮分子，数次被抄家，家产和图书全部被洗劫一空，两个集子的书稿也被扼杀于襁褓之中。当时集子已有书名，初集为《学步集》，次集称《独行集》，是应一家出版社约稿结集。尽管那些杂文，以现今眼光看，无论文字，还是思想，都极其稚气，且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，并不值得留念；但就我个人的过来的脚印说，也算是舞文弄墨的历史了，这里也当作个交待。

吾生也晚，加之学养的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，进入学术界的时间不仅很晚，而且从事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属业余爱好，并无师承可言，完全处于一种自我感觉、自我摸索之中。从严格意义上讲，根本称不上所谓的正规研究，论史料倒掌握了一些，就思考说尚无系统可言，所接触的人物和事件、所议论的问题和症结，似乎是有感而发，但是见解多属浮光掠影、浅尝辄止而已。

即使如此，也是得益于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运动，继之主编《晋阳学刊》十年，有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环

境,有了展布学术的媒体条件,才使余有可能跻身于学界,将自己长期思考的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课题部分地实施。由于50年代以来,政治运动频繁,学术研究无自主可言,学者把主要精力牺牲在了阶级斗争中;当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时,本世纪前后出生的学者均已进入耄耋之年,多数于学术研究已力不从心了,然他们却是近一个世纪的亲历者,在其大脑中储存着丰富的文化学术史料。由此想到了学术史的前期工作,即抢救老一代学者的口碑史料,这就是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》丛书的由来和续编同名大辞典的动因。

于约组传略的过程中,余有机会接触到国内许多著名学者,他们既是师长,又是忘年交之朋友,这些前辈的学术造诣、治学精神及人格力量,都给予我受用不尽的影响,为我进入学术史领域有着师范教诲的作用,当然由于自己的愚钝而难以学到这些先生的万一,这是常令自己遗憾和惭愧的事情。还有,在余进入学术史领域后,又见丁东、谢泳、智效民等相继研究20世纪知识分子群体和学术思想史,他们都比我年轻,他们的学术悟性都比我见长,他们的思维视野都比我新颖,他们的思考方法都比我独到,我周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群体,常在一起碰撞切磋,给予了我研究写作上的诸多启示,在我的作品中是离不开他们的帮助的。

1997年4月4日于速朽斋

目 录

(1) 自 序

- (1) “五四”前后:现代学术生态环境
- (5) 家学:现代学者成名渊源
- (8) 师承:现代学术繁荣渊源
- (11) 寻找火种:20 世纪初由日本转口输入西学及其他
- (15) 先驱者:五四时期的新村运动
- (19) 寻求真理者: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
- (22) 门槛里外:现代学者中的“遗民现象”
- (26) 思想文化也应开放:拿来主义一解
- (36) 现代文化的引进
- (50) 编辑型学者 学者型编辑本世纪的一条出人才之路
- (53) 清华大学与学术文化氛围
- (59)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家学渊源
- (70) 同是曾开风气人
- (76) 胡适给陈监先的三封书信
- (84) 梁启超与现代传记文学
- (88) 王森然与《近代百家评传》
- (92) 巴金与卫惠林
- (95) 百千鸿儒遍天涯: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
- (100) 天地有正气:学者在抗日战争中
- (103) 且说抗战中的校歌

- (206) **哲人其萎**
 (记冯友兰先生)
- (210) **美学家编辑生涯**
 (记宗白华先生)
- (213) **乾嘉学派的殿军**
 (记孙楷第先生)
- (216) **《长恨歌》争鸣**
 (记周煦良、俞平伯先生)
- (220) **话说吴宓**
 (记贺麟先生)
- (223) **笔墨情缘**
 (记苏局仙先生)
- (226) **历史已证明他是强者**
 (记沈志远先生)
- (229) **补白大王**
 (记郑逸梅先生)
- (233) **傅山是应当研究的**
 (记范若愚先生)
- (237) **惊涛拍岸见砥柱**
 (记杨献珍先生)
- (241) **学者型作家 作家型学者**
 (记冯至先生)
- (244) **檀联圣手**
 (记张伯驹先生)
- (248) **著作万篇 难成一传**
 (记罗尔纲先生)
- (252) **革新教育与革新社会**

- (256) 知耻近乎勇
(记雷沛鸿先生)
- (260) 笔走龙蛇七十年
(记靳极苍先生)
- (264)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
(记邓广铭先生)
- (269) 独居高楼再自修
(记谢兴尧先生)
- (274) 善藏其器 善待其用
(记王利器先生)
- (281) 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
- (283) 生活经历激发思考
(记王元化先生)
- (290) 假如没有陈敏之
- (293) 永不毕业 长葆青春
(记蔡尚思先生)
- (299) 攄军史研究第一家
(记江地先生)
- (304) 考古学家的另一面
(记张颌先生)
-
- (309) 迈向“观堂之学”研究的新境界
- (319) 廓然大公 物来顺应
(《梁漱溟传及访谈录》序)
- (330) 罗尔纲《师承四记》跋语
- (339) 重读《甲申三百年祭》的思考

- (347) **惟有不忘“过去”**
- (350) **地域与藏书家**
 (《山西藏书家传略》评介)
- (354) **弘扬晋商文化之力作**
 (评《晋商兴衰史》)
- (356) **自知才上层楼 尚须展布群才**
 (谈现今学界人物辞典)
- (359) **传记岂可“离史叛实”?**
 (当今人物传记出版现状述评)
- (365) **“文集热”中话文集**
- (369) **全集岂能选?**
- (371) **《胡先骕文存》与“补遗”**
- (374) **主编《晋阳学刊》的十年探求**

“五四”前后：现代学术生态环境

时代跨越到 20 世纪，现代学术的特征之一就是中西文化学术的交融性程度好，“五四”前后，西学被大量地介绍与引进到中国。

说现象，那个时期实在是乱极了，外来之主义、思潮和学说可谓多矣，但从社会与历史的大变动，从文化学术的发展规律看，它却创造了极为优良的文化学术繁荣的氛围。如果说“五四”前后，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一次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的话，它之积极意义，不仅在于开创了一个开放宽松的时代，而且出现了中西文化学术的碰撞和交融，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家，产生了一系列学贯中西的著作。

在这时期，出现了一批引进西学有贡献卓著者，他们是把中国现代人的眼界打开之先驱者，是把中国文化学术建立于近代科学基础上的划时代人物；即使有些人物在他们的前后期，思想倾向发生了变化，甚至在政治上趋于保守，但也难以抹煞其启蒙思想家的光辉。

今年正是严复著译《天演论》问世一百周年。人们在“西学东渐史”上，首先要论及严复，原因在于“西学”从明末传入中国以来，长期译介的主要是自然科学，只是到了严复时代，他才率先系统地引进了进化论、唯物主义的实验论、古典政治经济学、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逻辑学著作，它在中国思想界和文化学术界的振聋发聩作用，就在于其在思想史上的重大飞跃，使得向西方

寻找真理的活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,从现象迈进到本质的过程中达到了一个崭新阶段。严复翻译的八种名著多出版于1903—1912年之间,通过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,因此可以说:“从严复同代或稍晚一些的人,到鲁迅的一代,到比鲁迅更年青的一代,无不身受其赐。”

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,改良主义的小说理论在国内盛行,严复和梁启超、夏曾佑等都强调小说有不可低估的感染力。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与“经史子集”并列的“说部”。而林纾一生翻译了179种欧美和日本小说(作家计有莎士比亚、狄更斯、欧文、笛福、斯威佛特、孟德斯鸠、大仲马、小仲马、雨果、巴尔扎克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塞万提斯、易卜生和德富健次郎等),其开近代翻译小说之先河,功不可没。

马君武于青年时代受到维新变法影响,1901年留日后接触到西方新思想和学说,陆续译介了斯宾塞《女权篇》、达尔文《物竞篇》(合刻1902年)、斯宾塞《社会学原理》(1903年)、达尔文《天择篇》(1903年)、约翰弥勒《自由原理》等西方名著,均列入“少年中国丛书”出版。1905年他最早向我国译介拜伦《哀希腊》,1913年翻译了歌德的诗歌,1916年翻译了席勒的剧本《威廉退尔》,被文学史家推为有影响的名译之一。他还先后翻译过自然科学,在30年代仍然继续翻译了达尔文重要著作《人类原始及类择》和海克尔的《自然创造史》。他认为进化论的出现,摧毁了唯心的造神论、目的论、物种不变论,给宗教以沉重的打击,可使人们从迷信思想中解放出来。马译虽在严译之后介绍进化论及西方学术,但它系列性地追求和适应社会需要的意义不可低估。

在本世纪初,被译介引进中国的主义、思潮和学说,简直多

到使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，可是最后历史和文化还是作出了自己的选择。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，同样是从外国引进的，可是它却在众多的主义、思潮和学说中被中国接受，使中国现代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译介史上，有这样一些学者名垂青史：李大钊、李达、瞿秋白、陈望道、蔡和森、陈启修、杨贤江、王亚南、郭大力、沈志远、何思敬、张仲实、吴亮平等。当然在介绍西方其他学说方面的内容，也不应忘记王国维、胡适、鲁迅、杨昌济、汤用彤、李石岑、张东荪、张申府、余家菊、蒋维乔、谢幼伟、陶希圣、孙本文、吴文藻、高觉敷、任鸿隽、张耀翔、梁实秋、朱光潜等学者的贡献。

张申府在回忆他介绍西方学说时讲：“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。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，后来都流行了。特别是罗曼·罗兰、罗丹、罗讷、巴比塞、伊本纳兹，等等都是。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。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，我深自引为光荣。”他是最早向国内介绍罗素哲学的人，特别推崇罗素的数学逻辑理论。他在推崇罗素哲学的同时，又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，虽然看到了二者之差异，却不认为存在着本质的不同，而认为二者可以结合“互补”。他认为这两种哲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。他还从两种学说的某种共同背景中阐发了自己的见解。我们从这里看出，一个学者介绍某种文化学术，绝非是一种盲目举动，而是基于其理解基础上的。如果以封闭僵化的心态排斥之，必然难以吸收到世界文化学术中的有益因素。开放引进与吸收外来文化学术，有如吃饭，善食者长，不善食者病，关键决定于自身。

对于那种既无接触西方文化学术的经历和机会，又与国外隔绝而缺乏西方文化学术资料文献，却在那里大言不惭地大谈西方文化学术的缺失和中西文化学术交流，以揣度、成见和主观

推断而排斥之,确实带来了许多后遗症。有鉴于此,在开放改革的今天,实在应该继续破除一下思维僵化、意识偏见和自以为是的迂腐积习。

1995 年 5 月

家学：现代学者成名渊源

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》出版后，受到了学术界之称誉。有鉴于此，有友人提出要我写些编撰随笔，他说：“由这部大辞典我想到一些问题，如为什么三四十年代，中国出了这么多的大学者群（第一流），而这些学者水平和今天中青年学者比较（尤其是文史哲），可以说还无人能望其项背。我兄于主编此书，足可以发一些客观之见，探窥其原因及其轨迹。”显而易见，这是一个极难做的题目。

学者群的产生，当然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现象，这其中涉及到时代背景、历史条件、学术传统、文化氛围、师承关系、家学渊源以及个人勤奋等多元因素。

本文只谈家学。

中国历代学者都重视家学渊源。家学可理解为家庭世代相传之学。家学世代相传，说明根基深厚。明呈植《〈剪灯新话〉序》有“宗吉家学渊源，博及群集，屡荐明经，母老不仕”之说；清钱谦益《浙江布政使引右参政青叔元授中大夫父芳加赠制》中也有“盖不独先河后海，礼不忘始；而家学渊源，名教积习，亦有可以考见者焉”之载，可见家学之重要。到了本世纪前期，随着辛亥革命和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，家学渊源虽不及清以前为重，但在学者世家仍保持着它的地位及其传承力度。

辞典中收编了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严复和陈寅恪等跨世纪的学者，他们之有家学渊源，自不待言。

据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载，其世以理学传家，祖父道光举人，治程朱理学。康有为自幼即受儒学思想熏陶，五岁“诵唐人诗”；八岁“读圣经”；九岁“从崔清献词”；十一岁“览纲鉴知古文”、“观《大清会典》、《东华录》而知掌故”，“读明史，国志”；十三岁“从陈蕃先生学”八股文；十四岁“应童子试”。从少年就决定了他要走一条童生、秀才到进士而进身的仕官道路。从他后所著之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和《大同书》，更不难看出他的家学根底。康有为长女康同薇，自幼力行其父主张，为近代妇女界开新风的著名代表之一；十五岁即据二十四史编纂《风俗制度考》，后大量翻译日本书籍，协助其父编辑《日本变政考》、《日本书目志》；创办《知新报》，是中国第一位女报人，是中国最早的妇女报刊创办人之一。

梁启超祖父、父亲都是当时颇有势力的乡绅，其本人1889年考中举人，在众多学术领域都有重要开拓和贡献；其弟梁启雄、梁启勋，都是著名学者；其长子梁思成是很有成就、有影响的考古学家、古建筑学家，次子梁思永在考古学、人类学方面均有建树。

在本典中可以看到众多父子学者，诸如严复与严群，柯绍忞与柯昌泗，商衍流与商承祚，马衡与马彦祥，柳亚子与柳无忌，黄文弼与黄烈，朱孔彰与朱师辙，马宗霍与马雍，光晟与光仁洪，金光平与金启琮，吴孟复与吴怀祺等；可以看到大量兄弟、兄妹学者，诸如陈衡恪及陈寅恪，沈兼士及沈尹默，张尔田及张东荪，张申府及张岱年，冯友兰及冯沅君，蒙文通及蒙思明，鲁迅及周作人，潘梓年及潘菽，容庚及容肇祖，吴其昌及吴世昌，吴景超及吴承禧，陈邦怀及陈邦福等。有趣的是，还有许多叔侄学者，像黄侃与黄焯，顾廷龙与顾颉刚，傅斯年与傅乐成、傅乐焕等；还有许多夫妇学者，像陆侃如与冯沅君，钱钟书与杨绛，费孝通与王同惠，

张耀翔与程俊英,蒋孔阳与濮之珍,严景耀与雷洁琼等;还有翁婿学者,像余嘉锡及周祖谟,童书业及黄永年等。这种祖孙、父子、翁婿、叔侄、兄弟、姐妹、夫妇同典的情况,除了所反映的家学渊源之风范外,从另一角度也可体现师承关系等文化传统。这种情况,为什么到了当代却又少见了呢?其中道理及其原因,确需深入探讨,很可能是有益于当代及今后的文化学术发展的事情。

1994 年 12 月